

# 明清以来雁北地区<sup>①</sup>主要庙会综述

李富华 陈纪昌

(大同大学中文系，山西 大同 037009)

**摘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地民众开始大规模自发组织修庙并组织庙会活动。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纷纷加以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长期以来，对于雁北地区的庙会活动却无人问津，这对庙会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据现存的雁北地方志资料对该地的庙会作一概述，以期促进庙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庙会；雁北地区；龙王；关帝；城隍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7)03-0032-06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庙会——这一已经销声匿迹的历史现象又死灰复燃，各地民众开始自发组织修庙并开展庙会活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些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也开始支持这一活动。很多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也大规模修庙建庙，例如榆林地区，该地区共有12个县市，均为庙会活动频繁区。据有关部门调查估计，全地区有跨乡镇或跨县活动的大庙300—500座，乡镇范围内活动的约1000座，小庙保守估计1万座以上，即使按照最小规模和最低造价测算，榆林地区民间投入修庙的资金高达2亿元左右<sup>②</sup>。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见解。本文主要介绍雁北地区历史上以及现在还存在的主要庙会，以期促进庙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 一、雁北地区的主要庙宇

雁北地区历史上庙宇众多。北魏在大同建都时，周围寺院上百所，僧尼三千人，云岗石窟、永宁寺和悬空寺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辽金在此地建有华严寺、善化寺等巨刹名寺，元代道士丘处机毁西京天成夫子庙，谋占佛教寺院达482所之多，可见当时寺庙之多。据现存雁北地区明清地方志记载，当时同朔地区有明确记载的寺庙就有454座，“余各边堡、乡

村，各有庙宇，不及悉载。”<sup>③</sup>可谓寺庙林立，庵堂相望。该地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庙宇，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雁北地区地处高纬度，气候寒冷，冬季“冬至节后，冻厚数尺，积雪不消，大寒小寒，严风冷雪，堕指裂肤”；“夏至以后，虽三伏盛暑，”也“少穿葛纱，早辰夜暮，不离绵衣。”<sup>④</sup>因热量不足，因而该地庄稼为一茬，且产量甚低，“丰岁亩不满斗。”<sup>⑤</sup>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尤以雹灾、霜灾、旱灾为主，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故人们往往将丰收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而且雁北地区地处边塞，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接壤之地，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从秦汉至唐宋以至明朝，历来是中央王朝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交锋地区，战事频繁，史称“寇略无虚日”。为求战事取胜和生命安全，不论是汉人还是胡人，都是见庙即烧香，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因此，修建庙宇成为军队作战间隙的一项业余活动。军队如此，普通百姓对于生命的无助体会更深，故而该地的寺庙特别多，“顾自汉唐以来，三教并行，寺观且遍天下，郡介边方，其俗尤盛。”<sup>⑥</sup>

处于边疆之地使雁北地区具有另外一个不同于内陆地区的特点：驻军特别多。据《大同博覽·要事纪略》载，明代大同镇统八卫、七所，额军十三万五千，马步军总数多达全国兵力总数的十二分之一，其所辖边墙达647里，城堡583座<sup>⑦</sup>，这就使雁北地区进行边疆互市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到清

收稿日期：2006-06-04

作者简介：李富华（1963—）女，山西阳高人，大同大学中文系书记、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

陈纪昌（1977—）男，山东泰安人，大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

①历史上，长城在蔓延到山西北部地区后，分为两路，南路从河北阜平而进入灵丘、浑源，再经应县、繁峙、神池而至老营一带，称为内长城；一道从北路蔓延到天镇、阳高、大同、左云，经右玉沿内蒙古、山西交界处达于偏关河曲一带，称为外长城，雁北地区即是人们对内外长城之间地区的习惯叫法。1971年山西省政府正式成为雁北行署，统辖阳高、天镇、大同县、灵丘、广灵、朔县、怀仁、左云、右玉、平鲁、应县、浑源、山阴十三县，这种划分大致和明清时期的大同、朔平两府相吻合，因此这里的研究主要针对此范围。

朝时期，大同境内开设的马市尚有八个<sup>①</sup>，所以商业经济特别发达，明正德年间《大同府志·风俗》曾这样形容大同的商业，“其郡城内，藩府有常禄之供；将士有世禄之养，商旅辐辏，货物涌贯。虽曰旁边绝徼，殆与内地富庶无异，而奢靡过之。”<sup>②</sup>这给大量寺庙的修建提供了条件。

寺庙的存在，为庙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础。大同庙会此起彼伏，颇为繁盛。姚斌先生曾详细列举了雁北地区曾有或现在还存在的庙会，从正月初八的八仙日开始，二月初三帝君庙会，三月初三曹夫庙会，三月十八娘娘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会，四月十五鲁班庙会，五月十一城隍庙会，六月初一玉龙洞庙会，六月十三龙王庙会，六月十九观音庙会，五月十三、六月二十三关帝庙会，六月二十三火神庙会，七月十五龙池盂兰会，八月二十七文庙会等等，此外，城郊诸如沙岭、寺村、阳和坡等村春祈秋报也相继举行庙会<sup>③</sup>。古代文献对此从各个不同方面做了记载，据《朔平府志》载：“至士子祀先师文昌，农祀龙神，市人祀关圣、财神，各从其类，然多聚会敛供，各庙演戏，四时不绝，一近党，二伤财，三废业，引人子弟，荡人心志，非美径也，宜裁酌之。”<sup>④</sup>这段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庙会之多，并由此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以致引起官府注意。因为庙会太过频繁，所以民间作戏之风盛行，不得不加以整顿，地方官员甚至不得不下告示明令禁止：“明系一、二会首，棍徒，敛人钱财，上供唱戏，饮馔数日，庙祝利其布施，敲钟打鼓，以为善事，满城如狂，终岁不绝。引得少年子弟，荡乱心志，而且村乡妇女，杂沓聚观，明为作戏，实为作弊，……因此，劝人少作戏。”<sup>⑤</sup>

## 二、雁北地区的主要庙会活动

纵观雁北地区的庙会，根据其祭祀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 (一) 与农业有关的庙会

农业虽是古代的主要经济活动，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为保证丰收，农民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神灵身上，春祈秋报就是古代十分重要的一个仪式。鉴于农业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封建政府也把春祈秋报列为国家祀典之一，从而也促进了这一活动的普及，“春祈秋报，礼也。”<sup>⑥</sup>《礼记·月令》明确写道：“孟春三月，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sup>⑦</sup>旧时地方官，例于立春前一日，公服率绅耆吏役，出迎春牛芒神于东郊，谓之迎春<sup>⑧</sup>。这一活动在雁北地区也广泛存在，成书于清朝顺治年间的《云中郡志》写道“乡村，三月春祈，八月秋报神庙前，扮乐赛享。”<sup>⑨</sup>《大同县志》亦云：“其农人尤虔祀龙神，春祈秋报，必醵钱献牲，演戏。”<sup>⑩</sup>《广灵县志》、《左云县志》、《浑源州志》中亦有同样记载<sup>⑪</sup>。

<sup>①</sup>《广灵县志》：“乡村二三月春祈，八九月秋报，在神庙前扮乐飨赛。”《左云县志》：“左云之西郊，旧有风雨八蜡之庙，春秋享祀，岁时报赛。”

<sup>②</sup>《浑源县志》：“乡村二三月春祈，八九月秋报，在神庙前扮乐飨赛。”

<sup>③</sup>乾隆年间会期为六月初六日，引自《广灵县志》（乾隆本），78页。

什么是春祈呢？“祈年祭，于每年春耕伊始，在城内龙王庙由农民设供，祈祷丰年。”<sup>⑫</sup>是谓春祈。春祈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叫法，怀仁地区称之为打春，当地县志记载为我们描绘了这种仪式的完整过程。立春前一日，“先期塑芒神、土牛，长官率僚属，农夫执耕具，鼓吹张乐，迎春东郊。次早，众官集公衙，鞭牛行礼。”<sup>⑬</sup>对此，《左云县志》有更为详细的记载，“立春前一日为‘迎春’，官司预塑芒神、春牛，备春花、彩仗。邑侯率僚属、农夫，执耕具，陈鼓吹，扮杂剧，迎春于南门外之东郊，次日春至，众官集县衙行礼，击鼓鞭牛。”<sup>⑭</sup>大同地区则称之为迎春、演春，“迎春塑春牛、芒神，与各处相同。立春前二日，优人、乐户、妓女各扮故事，乡民携田具，唱农歌为兴，作东事之，状共一处，名为演春。”<sup>⑮</sup>

一般农民每年于秋收完毕后，在城内龙王庙由农民设供、献牲、演剧，以报五谷丰登神府默佑之意，“十月十五日，社祭，五谷神，仿吹豳祭蜡之义。”<sup>⑯</sup>是谓秋报。

举行春祈秋报活动的地点，不同地区不尽相同。除上文提及的龙王庙，八蜡庙亦为选择之一，《左云县志》：“左云之西郊，旧有风雨八蜡之庙，春秋享祀，岁时报赛。”<sup>⑰</sup>有时也在固定的寺庙举行，灵丘县每岁的迎春仪式就在城东的福智寺举行，“福智寺，城东，元时建，每岁迎春于此。”<sup>⑱</sup>

充足的雨水也是农业丰收的必要条件，雁北地区处于中国内陆，气候干燥，雨水较少，祈雨成为农业生产中经常出现的活动，祀龙神就成为保证农业丰收的另外一个保证手段。旧地方志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书中屡屡出现何处祈雨最灵验的内容，以《云中郡志》为例，仅《方舆志·山川》篇中关于祈雨的记载即有 12 处！且对于龙神的祭祀也是不遗余力，“其祭祀，凡庙祀先祖时节，献新之礼，士大夫家多行之，庶民或阙略焉。然颇恪于外祀演剧，献牲，酬神。许愿所在皆有，尤虔奉龙神，每祈祷雨泽，辄令女巫、乐户、歌舞佑享，愚民奔走若狂，岁以为常……。”<sup>⑲</sup>在中国古代，各地均建有大量龙王庙，雁北地区也不例外，有的地方甚至有不止一座的龙王庙。能为人们带来雨水的并非只有龙王，他的亲属亦能履行该职责。明清时期，广灵城一地即有龙王庙四座，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社台山龙王庙，这儿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康熙年间写就的《广灵县志》写道：“六月十三日，社台山祭赛龙神，凡三日。”<sup>⑳</sup>不仅龙母可以祈雨，龙婿同样可以，据《怀仁县志》，在怀仁县西南十五里“有五龙池一座，广亩余，深不可测，菱芡青葱，鲤鲤潜跃，旁建五龙玉婿庙，祷雨辄应，每岁五月十八日，报赛游人甚众。”<sup>㉑</sup>

尚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龙王的身份可以变化，其职能也并不是单一的主雨，有时也管分水。浑源地区有一流传至今的庙会——六月初一唐家庄庙会（当地人俗称唐屿龙王庙会）主祀龙王，然据当地人叙述，祭祀之目的并不只祈雨，还借此协调当地用水之矛盾。据说在明朝末年，唐家庄、城关的

南关以及东坊城、郝家寨等邻村为了争夺唐屿水灌溉田地，经常打官司。后来，经过协商，成立了“水庄社”，订立了轮流施水的办法，每年按亩分摊水费，除付给浇地的人工钱外，余下的钱便在农历六月初一为唐屿口的龙王庙举行祭祀活动<sup>[137]21</sup>。

随着时间的推移，祭祀的主体也在悄悄的发生变化，专门的祭祀群体逐渐形成。大同县的菜农在每年举行“开园”活动，“六月六日，凡有菜园之处俱敬龙神，延宾共享龙神，”<sup>[10]66</sup>怀仁亦有此俗。

农业生产活动周期长，意外因素多，为了保证丰收，农民还祭祀其他与农业活动有关的诸神，例如风神、霜神、雹神等等。围绕这些神灵，也诞生了很多庙会，比较独特的当数阳高县的胡神庙会。这儿的胡神指的是春秋时代晋人狐突。据《印雪轩随笔》之记载，在河北万全县“往北十里许，有名糊涂庙者，不知所使。或云县与山右接壤，庙祀晋大夫狐突，音之讹而为此，理或然也。今之庙额则曰胡神，其貌须猾卷，而（面）状狞恶，绝类波斯胡。相传七月朔为神诞辰，土人演剧酬神，远近毕至，男女焚香膜拜，三四日而已。土人云：神司雹于此，稍慢之，则硬雨为灾，秋稼必受其害，固奉之不敢不虔，……”这说明狐突即为胡神。纪昀则进一步从音韵学的角度解释了他们之间的关联，“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涂神祠，土人奉事之甚严。……后检《通志》乃知为狐突祠……狐、糊同音，北人读入声皆以平，故‘突’转为‘涂’也。”<sup>[14]</sup>由于狐突“义不事二”的事迹，深合统治者口味，因而大力宣传，“宋封忠惠护国利应侯，明洪武初止称本爵，岁中元土人以神诞报赛，永乐中加香烛价米三石六斗。”<sup>[15]66</sup>故而在山西影响甚广，对他的祭祀遍及三晋大地<sup>①</sup>。据此阳高县的胡神亦应为司雹之神，据《天镇县志》载丙寅丁卯，天镇雨雹，“大如鸡蛋，小如弹丸，四乡禾稼半伤”，知县张坊“闻邻邑雹神祠，往祷于阳和之许家园”，其神为胡神，“庙碑独纪狐突之有功于民，明万历间加封西齐胡神大帝云。”<sup>[16]137-139</sup>

## （二）关于求子嗣的庙会

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当人类文化的前期积累还不足以发现更有效的能源，发明更精良的劳动工具时，“人类有机体便成为第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为了这种能量的扩大再生产，在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的情况下，只有掌握了人本身，才能创造出文明与财富，因此，增加人口便成为人们的迫切愿望。”<sup>[17]264</sup>由此人们追求高生育率便不难理解了。同时，父系社会中财富继承主要以男丁为主，所以，对男孩的追求尤成为重中之重，古人认为“长寿、富贵、多子孙”乃是人生之福，反之，如果没有男孩，则会被人耻笑、凌

辱。时至今日，这种对男孩的偏爱观念并没有杜绝，农村中称呼无子之人为“绝户”，“断子绝孙”亦成为人们诅咒对方的恶毒用语。生活在这种氛围中，对男孩的强烈追求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医学条件相对落后的古代，求神问卜便成为实现人们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在民间信仰中的体现便是各类奶奶庙、娘娘庙的产生，并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求子类型的庙会。因为这一类型的庙会一般在农历四月举行，因此四月庙会又被称为“求嗣节”。

坐落于浑源境内的恒山乃是中国传统五岳中的北岳，封建政府每年都要进行祭祀，故而北岳庙在雁北地区的分布极为广泛。神灵是人间世界在天上的反映，帝王是人间的主宰，其配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间妇女的总管。北岳大帝主管人间之事，其配偶北岳娘娘便荣登主管子嗣的诸神之一。在怀仁，每年“四月初七日起，初九日止，城乡男女于东关南阁外北岳娘娘等庙”进香。<sup>[19]18</sup>在恒山，每年四月八日举行庙会，“途间往祀北岳者，男女摩肩接踵，庙内香烟冲霄，烛焰腾空。”<sup>[19]46</sup>大同城四月八日那天，人们也“赴北岳庙<sup>②</sup>焚香进纸，铺行各行于关帝庙献唱数日，供设花盘，纸工极其精洁。”<sup>[3]67</sup>北岳神有时甚至也成为主子嗣的神灵之一，在广灵地区，“三月十七日，远近男女负载香楮，登千福山北岳神祠，拜祷祈嗣。”<sup>[18]43</sup>到民国时期，干脆以奶奶庙会名之，“三月十六至十八日，千福山娘娘庙会。”<sup>[18]43</sup>

碧霞元君作为泰山诸神之一，是中国民间所认可的又一主嗣神灵，对其信仰亦遍及雁北地区。每年的五月十三日，左云地区在享祀关帝之时，民间同时叩拜碧霞元君，“是日，碧霞宫设立‘花儿会’，凡小儿多病者，带草伽，叩拜圣母殿前。”<sup>[19]19</sup>该会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据日伪时期修订的史志记载，“阴历五月十三日，一般民众妇女俱上庙顶香膜拜，祈求子嗣。在城内东岗娘娘庙祭之。庙内集小孩玩具及各种物品者繁盛异常。”<sup>[11]34</sup>广昌县有泰山行祠，“东关外，上有古塔，下有深泉，传为古刹，每年四月十八日，土人飨赛，商贾并集。”<sup>[11]46</sup>广灵在四月二十七至二十九蕙花村举行娘娘庙会<sup>[19]60</sup>，这儿虽没有明文点出娘娘的具体姓名，但《云中郡志》载有“东岳行宫，在蕙花村前”，可见此处的娘娘亦应是碧霞元君。

曹奶奶是雁北地区流传甚广的又一位送子娘娘。大同南郊有黄箓观，每年农历五月十五为庙会，自怀仁而北五六十里外的村民多来赶会，给曹奶奶送毛驴，求子祈嗣，当日，卖“纸驴”的摊子生意最旺。“奶奶庙”<sup>③</sup>前焚烧的锡箔灰，从中可澄取金属铂五六十斤<sup>[19]62</sup>。在应县，每年四月初八、四月十八举行庙会，当地人祭祀曹奶奶<sup>[20]13</sup>。

<sup>①</sup>据《明一统志》、清《山西通志》、清《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古代祭祀狐突的地方有阳曲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兴县、平遥县、榆社县、沁源县、武乡县、平定州、乐平县。此外，河南荥阳等地也有胡神庙。

<sup>②</sup>此庙实为北岳行宫，据《怀仁县新志·坛庙》：“北岳行祠，一在东关南阁外……”105页。

<sup>③</sup>这儿的北岳庙是指在府城南五里的北岳行宫，《云中郡志》：“北岳行宫，府城南五里。”135页

<sup>④</sup>奶奶庙为黄箓观建筑群的组成部分之一，黄箓观庙会本为关帝庙会，传说五月十三日有关公的三分磨刀雨。引自执言《南郊寺庙纪略》，《大同今古》1994.4

圣母庙亦是雁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庙宇之一，且具体神灵多种多样，依托于此也产生了大量庙会。怀仁在四月会中，除拜谒北岳娘娘外，亦“入圣母庙仿古礼”<sup>①</sup>。古马邑县亦有“圣母庙，在县西北，四月八日多祈嗣於此。”<sup>②</sup>阳高县则在四月初八日，在孤山奶奶庙举行庙会，祭祀五龙圣母。

此外，担任送子娘娘神灵尚有王母娘娘<sup>③</sup>。其他尚不清楚送子神灵为何人但却存在庙会的也有许多，这在广灵有集中的体现，据 1992 年修订的县志描述，当地的奶奶庙会大致有三月十九至二十一的百疃娘娘庙会，四月初八至十四的南村庙会，四月十四至十六的直屿娘娘庙会<sup>④</sup>。

### （三）为维护人间秩序的诸神灵设计的庙会

雁北地区比较普及的该类神灵主要指关帝、城隍和玄武等等。关羽本来只是三国时期的一员普通武将，隋唐以前人们尚以鬼来对待他。可是由于他的一系列行为适应了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推崇，宋时被封为王，明朝正式载入祀典，且被封为帝，明神宗先是在万历十八年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到万历四十二年，又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由于历代官方的推崇，关羽在民间地位也急剧上升，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关帝崇拜，并且形成了无乡不有关帝庙的局面。有的县乡的关帝庙不止有一座，甚至有四五座的。围绕关帝信仰，民间也形成了一系列庙会。

雁北地区的关帝庙会主要是围绕关羽的诞辰而举行的<sup>⑤</sup>。对于关羽的诞辰，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明朝王昕《续文献统考·郡祀考》、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等记载，关羽诞辰日为五月十三日；但清朝徐道《历代神仙通鉴》、赵翼《陔余从考·关壮缪》中皆载为六月二十四日，五月十三日当为关平生日。雁北地区这两种说法均有。大同的关帝庙会是雁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由布行充当会首，组织进行，规模极大，参与人数众多。明张钦所作《大同府志》载云：“五月十三日，民间祭飨关王庙。有幼儿女者，锁伽其项，以为免罪。凡三日，城中鼓声不绝。虽藩府亦然。”<sup>⑥</sup>这种庙会到清代仍在进行，《云中郡志》载“五月十三日，营室治祭，享祭伏魔帝君庙（蜀关羽），凡三日，鼓乐不绝。”<sup>⑦</sup>除此之外，怀仁、浑源、广灵、右玉及左云皆有此俗<sup>⑧</sup>。

在雁北地区亦有在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关帝庙会的，除上文提及的大同县外，比较典型的当数左云、阳高。（左云）当地俗传此日为“关帝诞辰，邑人建斋设醮，或演戏酬神。”<sup>⑨</sup>而阳高城农历六月二十三——二十五祭祀关公的庙会在当地被称为“迎供”。该会闻名四方，影响颇大，不仅本县城乡群众踊跃参观，外地客商届时观光者亦不少。据景子如先生

描述，“迎供”的活动形式有：

关帝庙的全副銮驾仪仗，十二桌“供楼”，檀香，对子马，鸣锣开道，鼓乐喧天，还有鞍韂齐备的枣红马一匹，扮马童的二人左右随着，作为关公的坐骑，中间八人大轿抬的关公泥塑。最使人感兴趣的是：抬阁八架（内容有：张生戏莺莺，洞宾戏牡丹，断桥，狮子洞，张三跑马，鹿鹤同春，小姑娘磨，麒麟送子），背阁十二架，内有两架双背阁。参加表演的是七、八岁的俊秀男儿儿童，加上装潢奇特引人入胜，此外还有寿星斗狮子，竹马，穿心官等，整个队伍约有三百米长。二十四日是正日，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个面面（微小的意思）巷，凡能通过的街巷都要走遍，前后两天内容有所减少，游行路线也缩短。过“迎供”是阳高城最红火热闹的节日之一。<sup>⑩</sup>

城隍亦为古代神灵。据学者考证，在唐朝时期，城隍信仰已经在民间相当普及，“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且当时诸多地方官皆有撰祭城隍文和祭祀城隍神者，许多文人也都撰文祭祀或载述当时的城隍信仰之盛况，张说、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李阳冰、段金纬、吕述、杜甫等皆有关于城隍的文字<sup>⑪</sup>。然其普遍化、制度化应在明朝。由于朱元璋的提倡，城隍成为显神之一。其时城隍不但按照人间官吏的模式被划分为一个严密的等级，接受各种品级，而且其职能亦在逐渐完善多样。《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载，在洪武二年（1369）正月，朱元璋下诏，敕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全国城隍神的等级也作了划分，将城隍神设定为首都应天府（1），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2），府（3），州（4），县（5）五类等级。对于城隍的作用，朱元璋认为：“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民间则这样评价城隍之作用：“若城与隍，所以保障乎民生，通节乎内外，默相荫佑，厥功彰大。于旱蝗则祷之，于疠疫则禳之，于岁时则报赛之。”时人甚至认为人间官员管人间，城隍管阴间，仅是阴阳不同而已<sup>⑫</sup>。正因为城隍有这样的大作用，所以民间“祝他祠以令式从事者为尤谨”。

雁北地区的城隍庙会最著名者当数大同城的城隍庙会。这是该地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城隍庙会。由大同商绅各界联合组成的“城圣神”（民国初改为盖城社）主持组织，时间长达八天，覆盖范围极广：

不但城关居民倾城出动，连周围二州七县（应州、浑源州、大同、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怀仁、山

<sup>①</sup>据新县志，此处的圣母应该是三圣母，“四月初八，东关南庙（奶奶庙）盛会，家家祈求三圣母保子女平安。”《怀仁县志》，周子君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年版。

<sup>②</sup>朔县每年四月八日举行庙会，“每到这一天，人们便到奶奶庙（即王母娘娘庙）挂红子、燃黄表，送泥娃娃祈求奶奶显灵降恩，得以生儿育女，灭病去灾，人丁兴旺，香烟不断。这种活动，称作求嗣，所以四月八成为求嗣节。引见桑源《朔县四月八》，《雁北今古》，1989.1

<sup>③</sup>当然也不排除例外，在应县，正月初八，城内关帝庙会，会期三天，吴真社主办。引自《应县志》，马良主编，人民出版社 1992 年，613 页。

<sup>④</sup>怀仁五月十三日在“关帝庙演戏、祭赛。”广灵从康熙时期既有此俗：“五月十三日，献戏、设供，祭飨伏魔大帝，凡三日。”右五：见《朔平府志》载“五月十三日，关帝庙，演戏、祭赛，各处皆同。”左云：“五月十三日，享祀关帝。”

阴)的百姓也要搭车,骑牲畜进府城赶会。当时连商界和小学生,在赶会期间均放假半日,农民上午锄田,下午赶会,庙会几以成全民之节日。五月十一日为庙会正日,参会不少人是为了求子、求寿、免灾、却病。庙会期间,在城隍庙街口用芦席堵一横墙,对起会的人不论老幼一律以铜板两枚(二分钱)方许入内。会场内外设摊叫卖的各业商贩,需出地铺钱款。庙院内外附近空场上设置棚房,卖估衣、头戴、花粉、小吃、杂货、玩具、香表及农产品的应有尽有,还有练拳、卖艺、变戏法、耍马戏、拉洋片的,甚为热闹。庙会白天唱戏献神,往往两班戏同时对演,夜晚请和尚念平安经,城隍庙会每年庙会收入约五千元(白洋)以上,锡箔、香表及供献、祭品等物的浪费数字无法估计。单就焚化锡箔一项来看,从锡箔中熔炼出的点铜,每次庙会可回收数百斤<sup>[23][26]</sup>。

左云同样举行城隍庙会,时间在五月二十八日,当地俗传此日为城隍诞辰,“乡人随会者,置牲醴、果品,演戏建醮。”<sup>[18][19]</sup>广灵则在四月初十举行,时“阖邑士民献戏设供,祭祀城隍,以求福庇”<sup>[18][3]</sup>。

#### (四) 因宗教节日而兴起的庙会

这一类的庙会主要有两个,一为道教的“黄箓节”,一为佛教的“水陆道场”。

黄箓,道教的雅名,设坛普祭天神、地祇、人鬼,用以积罪祈福。左云地区,每年的七夕,鼎榆宫道家作“黄箓大会”,建斋设醮。是日,妇女亦有设香案乞巧者<sup>[18][5]</sup>。

水陆道场,又称水陆斋,佛教谓设斋供奉,以超度水陆众鬼的法会称为水陆道场。清朝时期,每年四月初八,僧家于极乐寺作水陆道场佛会。民国时期,左云亦于此日在东岗楞严寺举办释伽佛祭,一般官绅及各机关首脑皆届时参加之<sup>[18][6]</sup>。而保安堡的南寺亦于七月初七,举办水陆大会。据说此时的南寺异常热闹,百十来幅水策圣轴(工笔重彩轴子画)高挂于院内,两班经寺轮番吹奏,鼓乐喧天,香火昼夜不绝,前来祈祝之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东门外的龙王庙戏台还有艺班唱戏助乐,街头商业贸易兴隆,客商来往骤增,为庙会增添了活跃气氛<sup>[24][1]</sup>。

除了以上庙会,雁北地方志中提及但不易归类或内容不详的庙会尚有:二月初二,(广灵)文昌诞辰,旧时教育界集会<sup>[18][6][2]</sup>。三月初三,三皇会,盲人集会<sup>[18][6][3]</sup>。此日,朔州地区举行蟠桃会,“设醮、演戏、家客酿醋。”<sup>[24][7]</sup>怀仁、左云则在真武庙举行庙会“三月初三日,享祀真武。是日,多酿酒。”<sup>[18][8]</sup>三月十八,为蔡伦诞辰,(怀仁)纸房公推会首,在东关北阁龙王庙祭祀,唱戏。1949年后无此俗<sup>[24][8]</sup>。四月十七至十九,广灵朝阳寺举办庙会。六月初三,南岳府君庙会<sup>[18][9]</sup>。六月十八,左云

享祀蜡神<sup>[18][10]</sup>。十月初五,唐家会祭祀河神<sup>[18][11]</sup>。

### 三、余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雁北地区庙会众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庙会的存在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人们在庙会过程中的信仰因素,当地的物资交流也主要靠庙会,灵丘的崔府君庙会就证明了这一点。据《山西通志》记载,灵丘有“崔府君庙,在城西北,元建,泰定间重修,六月五日,土人飨赛。”<sup>[19]</sup>对此,《灵丘县志》有更详细的描述,“六月三日为南岳府君圣诞,士民祭祀惟谨,四方商贾皆至,邑之人终岁,日月所需以及男女婚嫁钗裙衣中自之饰皆于此日置办,市易三日毕,居民各归农业商贾亦行,岁以为常,后延长惟十日。”<sup>[20]</sup>广灵的东岳庙会在九月十五日举行,由于材料的匮乏,其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起的具体作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会期“半月而罢”来看,其市场的作用是明显的,单纯的庙会娱乐是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的。阳高的九月庙会则直接是为商品交易而设立的。据景子如先生描述,九月庙会实际是骡马交易大会,因为在南翁圈勒马关帝庙演戏,所以也叫庙会:

每逢过会,四路客商云集,整个一道南街除座  
商外,摊贩林立,绸缎布匹,针头线脑,儿童玩具,  
烟酒饮食应有尽有,赶会的人山人海,熙熙攘攘。  
马市上除本地的牲畜外,主要是内蒙的马牛,经阳  
高销往河北、山东等地。会期根据贸易情况而定,  
多则二十天,少则十天,一般为半个月<sup>[21][22]</sup>。

同时,古代社会信息闭塞,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庙会的存在为农村文化的活跃也提供了条件。《大同县志》曾对大同的关帝庙会的热闹场面有详细的描述,“布行祀关帝,仪极丰隆。献戏之外,又扮架戏十数出,举国若狂。颇有虑男女同途者,惟礼义自守之家能自禁约。至其奉帝君神像随架戏遍历街衢,殊为不敬。履经名人晓导,间有自知其非者,然积习已久,猝难遽变。”<sup>[19][10]</sup>这简直是全民的“狂欢节”!庙会的这一作用,早已被学者们注重。民国时期,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实验时,针对农村“愚、贫、弱、私”四种缺陷,提出要在农村实行四大教育,其中之一即是文艺教育,主要措施有三项,推广农村戏剧为其一<sup>[23][10]</sup>。

今天,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依据农村实际状况,活跃农村文化气氛,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今日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之一。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要想丰富发展农村文化活动,如果单靠“上面下发、提供,只能满足一时,并不能解决长期的文化需要。鼓励、激发农村本土文化的自生和繁荣,既不必忧虑是否对路,也不用

<sup>①</sup>光绪年间庙会会期改为六月初一十日而罢。引自《灵丘县志》(光绪本),175页。而《山西通志》(四库本)则认为是六月初五:“崔府君庙在城西北,元建,泰定间重修,六月五日土人飨赛。”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六月六日为崔府君生日,六月三日为笔误。参考《雁北今古》1988.4

考虑经费问题,才是长久之计”<sup>④</sup>。由此看来,庙会这一古老的农村文化形式,尚有其存在发展的价值。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研究庙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全面挖掘并发扬光大。使这一传统文化形式在活跃农村文化中起到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乔林晓]

#### 参考文献:

- [1]樊光春.当代陕北庙会考察与透视[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 [2][清]刘士铭.朔平府志[Z].上海:东方出版社,1994.
- [3][清]胡文焯,等.云中郡志[Z].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
- [4]岳湘.大同博览[M].香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1.
- [5][明]张钦.大同府志[Z].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7.
- [6]姚斌.大同庙会与戏台[Z].大同今古(内部发行),1997(2).
- [7][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清]孙希旦.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清]李长华.怀仁新县志[Z].怀仁县志编纂办公室(内部发行),1988.
- [10][清]黎中辅.大同县志[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11][清]李翼圣.左云县志[Z].左云县志编纂办公室,1992.
- [12][清]灵丘县志[Z].灵丘县志办公室,1997.
- [13]山西省浑源县志编纂委员会.浑源县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 [1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M].
- [15]山西通志(乾隆)[A]四库全书.钦定大清一统志[Z]文渊阁本.
- [16][清]杨笃.天镇县志(光绪)[Z].天镇县志编纂办公室,1984.
- [17]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和实践[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 [18][清]广灵县志[Z].广灵县志办公室,1989.
- [19]执言.南郊寺庙纪略[J].大同今古(内部发行),1994(4).
- [20]马良.应县县志[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21]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Z].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
- [22]丁常云.道教的城隍信仰及其社会思想内容[J].中国道教,1997(3).
- [23]姚斌.大同的城隍庙会[A].山西风俗民情[Z].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
- [24]耿润生.保安南寺[J].雁北今古(内部发行),1988(4).
- [25]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26]陈原.如何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N].人民日报,2006-01-05.

## A Summary about Temple Fairs of the Yan Bei Region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Fu-hua CHEN Ji-chang

(Yanbei University, Datong, Shanxi 037009, China)

**Abstract:** Since 1980's, many local people have volunteered to repair the temple and build up the temple fairs. Some scholars have made researches on this phenomenon and obtained the plenteous results. However, nobody studies the temple fairs in the Yan Bei region, which can not but say is a regret. This text makes a summary over all the temple fairs of the Yan Bei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hronicles.

**Key words:** the temple fair; Yan Bei region; dragon king; Guan Di; God of the city